

对于这次会见,荣毅仁后来回忆:“小平同志礼贤下士,坦率真诚,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。其间,我提出了可以引进外资搞生产,还提出,要搞好生产,需要解决两个问题,一是人才问题,二是管理问题。另外,在对外合作中,国内各部门也需要协调。小平同志听完后就说,对外接谈,要有统一安排;一定要把项目选好,把负责人定好。他着重指出,要采取经济方法管理经济,排除不合理的行政干扰。他鼓励我要把事业搞好,不要有顾虑。要我全权负责,全权处理,包括用人权,处理错了,也不怪我。还叮嘱我政协的事可少管一点,以便集中力量搞经济事业。最后又说,如果工作需要,可以去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。小平同志的这番话,顿时使我增添了无穷力量。”

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,中信公司于1979年10月4日正式成立,直属国务院领导

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,荣毅仁从上海请来了原工商界的故友旧知,一起探讨。并花了几天时间拟就了关于建议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(后简称中信公司)的请示报告。报告送上去以后,邓小平、陈云、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快批示同意。

在改革开放之初,对由荣毅仁出面筹备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窗口,并不是没有人反对。邓小平大力为他排除干扰,提供工作条件。

同年4月,荣毅仁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率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西德,顺访瑞士、法国,参加了西德汉诺威国际博览会,访问了20多个城市和50多个工矿企业、银行等。亲眼看到西德在战后30多年中,由于利用外资、引进先进技术和



埋头苦干,在几乎是一片废墟的土地上建成发达国家,使他感受很深。访问中他向国际工商界人士透露了中国要改革开放的信息,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。同时也坚定了他创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的信心。

邓小平一直关注着荣毅仁筹办公司的进展。1979年纪念“七一”大会开会前,在休息室邓小平见到荣毅仁,问道:“公司筹办得如何?”

荣毅仁作了汇报。邓小平说:“人由你找,事由你管,由你负全责。”“要排除干扰,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,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。”以后有几次碰见时,邓小平又关切地问起有关的情况。他深知,一个党外人士办这样全新的公司,没有实权是不行的,一定要有“尚方宝剑”。

为了扩大公司的影响,国务院精心安排在7月8日正式公布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之时,同时宣布中信公司筹备组成立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,中信公司于1979年10月4日正式成立,直属国务院领导。

支持荣毅仁出山(下)

国际信托投资原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,荣毅仁他们拟订的公司章程中,即写有:“坚持社会主义原则,按照经济规律办事,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。”中信公司要按市场法则办事(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),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旧的经济体制发生撞击和矛盾。

1986年6月18日,邓小平接见来自海内外的荣氏家族成员。

在夹缝中拼搏的荣毅仁,在“吃第一只螃蟹”遇到较大困难时,曾好几次写信求助于邓小平。邓小平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并在信上批示让有关部门为之开“绿灯”,邓小平不单是支持某一个项目,而是支持荣毅仁把整个中信公司的事业办好,支持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个窗口很好地亮堂起来。

1987年,中信公司收购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.5%的股权,有人借口香港有人反对,百般阻挠。经中央反复讨论,最后得到邓小平的同意。

1990年中信公司又用100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公司20%的股权,这是继收购国泰航空公司股权之后的更为惊人之举。香港电讯公司是由大东电报局控股的一家大型上市公司。大东电报局出于1997年后的长远考虑,很想找一家有声望的中资公司合作,出让部分股权。他们选中了中信公司。中信公司凭着自己对外的信誉,不拿国家一分钱,不用国家银行担保,大部分在当地融资解决。此举被英国《世界金融》杂志誉为当年最佳融资项目。这本是一件利国、利港、利公司的好事,有人却向中央提出反对意见,一时空气紧张。在这关键时刻,邓小平高瞻远瞩,指出:中信在香

港筹资,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,由他们搞去好了。杨尚昆也明确说道: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,一定要支持它,维护它。

“由他们搞去好了”,一语重千斤!本来收购股权是一种投资,参与进去当“老板”,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高级形态。稳妥的公用事业股权是抢手货,岂能坐失良机?荣毅仁他们干了别人不敢想也不敢干的事,邓小平则以伟人的魄力在紧要关头拍板。

经过20多年的发展,中信公司已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国际化大型跨国企业集团

中信公司在努力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,积极投身于上海的经济建设。

1988年,中信公司挥师南下成立中信上海信托投资公司,加盟上海的经济建设。经过10年的发展,1997年12月,改制重组成立了中信上海(集团)有限公司。2001年12月,在中信上海(集团)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增资成立了中信华东(集团)有限公司。集团现拥有中信大榭开发公司、中信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华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等3家全资企业及上海中信基建投资有限公司、上海中信进出口有限公司等7家控股和参股企业。

1988年6月,总行设在北京的中信实业银行,建行仅一年,便南下,在上海开设分行。上海分行扎根于上海这片沃土,形成了自己既灵活适应市场又较为稳健的经营风格。1993年向上海贝尔有限公司提供2000万

美元的授信额度。2001年6月,再次与上海贝尔有限公司签订8亿元人民币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协议。至今总资产规模已达300多亿元,在上海的主要繁华街道、中心城区、开发区设立了18家分支机构,资产利润率、人均创利、资产质量等指标均居同业领先水平。

20世纪90年代,中信公司设在香港的子公司中信泰富参与投资上海杨浦、南浦两座大桥和延安东路越江隧道等项目,为上海的“一年一个样,三年大变样”作出了贡献。1994年初,由作为上海城建资金筹措主体的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(简称:上海城投)出面,将上海延安东路隧道50%的股权转让给了中信泰富。当年年底,又将黄浦江上的南浦、杨浦两座大桥和打浦路隧道20年的专营权作价24亿元,转让给中信泰富,此举为后来投资达22.26亿的徐浦大桥一举解决了建设资金。后来,上海城投又把徐浦大桥、沪嘉高速公路这两个项目20年的专营权也转到了中信泰富名下。

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培育、浇灌下,中信公司——这个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,取得了丰硕成果。1989年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时,邓小平又题词“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十周年”,表示祝贺。经过20多年的发展,中信公司已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国际化大型跨国企业集团。到2002年,中信公司拥有44家子公司(银行),总资产为5011亿元;当年税后利润达22.55亿元。

摘自《邓小平在上海》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新版

闷与狂

王蒙



10.爱情是永远的感动

因为有你,因为有爱,因为有时分的稳步进行,因为黄口小儿正在变成老到的成熟,因为美丽的少女承担住了所有的试炼,因为头发不声不响地变白,而皮肤上出现了突破想象力的老年斑点。因为年龄的高度已经超越了一号冰山,而经验实历已经贯穿了随便哪部连续十余卷的长篇小说。因为有爱的家庭比超级碉堡还坚固,因为在坚贞的爱面前小小的浮面的“响箭”——“咋呼”是小儿科般可笑。响箭与咋呼在王永民的五笔字型中重码。

在真诚与自然然而的爱情面前,你们那些响箭,那些咋呼,我瞧不起你们啊。

我们的爱情来自十八岁的年华。它延续到了八十岁你的离世。中间没有缺失一天一夜一小时一分钟。叫作山高水长,叫作与生同在,叫作与命同悲,叫作松柏常青,叫作夕阳如火,叫作往事依依。听,当年基层工会每逢周六晚上举行的交谊舞会的乐声又响起来了,那时候的大喇叭,叫作扬声器的,已经令我五体投地。《步步高》响起来了,两个版本,都是快四步。西班牙的《鸽子》响动了,是探戈。苏联的《大学生之歌》响起,可惜的是兹后几十年再没有听到过此曲。这个曲子有点活泼,活泼得有点轻佻,轻佻得让我想起上海的那种拆白党,但是不会的,那个时候认为随着旧中国的灭亡,不会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,已经没有拆白党了。我们这里是工人的舞者,是穿着劳动服、中山服、列宁服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又一员在翩翩起舞,正是我们,共产党人,才摆脱了旧中国的腐烂腐朽罪恶,人们摇摆着自得着因为明天只属于我们。我们是在户外的水泥地上跳舞的,水泥地上的舞蹈同样令人陶然。你揽着我的腰,我抱着你的肩,我们再没有封建、保守和畏缩。我们永远与林黛玉、梁山伯、祝英台、高觉新哪怕是罗密欧、朱丽叶、安娜·卡列尼娜的那种痛苦无缘。那永远的圆舞曲与狐步舞曲,那永远的《娱乐升平》《彩云追月》《糖果仙人》《蓝色的多瑙河》与《维也纳森林》,尤其是《风流寡

妇》!新中国带来的是新的生活……叫作什么都没忘。我们仍然回到了那鱼儿跃出的水花旁边,我们仍然吟味着生命即爱情的密码。历史是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,生命是生生不息,爱情是永远的感动。密码无须破译解读,只求暖心焰肺,拭目承悲。那些不承认人间有真正的爱情的可怜的朋友们啊,你们好可怜!不想念爱情的人当然永远与爱情无缘。不相信救赎的人永远无法获救。不追求真诚的人一辈子生活在虚伪的冰水里。只承认蛇蝎的人也只有如蛇如蝎般地终其一生。

你已经有一点点老了,你依咱们的传统习惯号称八十高龄。耄耋之年的说法使你觉得祖宗们很幽默。这字形也有点逗你玩儿的天真。视觉暗示是头发太多太乱舍不得花钱理发,还有蓬乱的胡须。说不定心情也有点芜杂,像是许久没有修剪的草或者灌木。

但是你说你昨天晚上还做了一个梦,至少二十年你没有做过此类梦了。

梦见一个黑溜秋厚的嘴唇、大眼睛姑娘叫着爷爷从你的后背搂住你的脖子,应许说会帮你从已经下班的储蓄所取出现金。你说你接连去了几次银行,你苦于排队,你放弃了如期取款希望。女孩子说她能,她做出过纳要不就是会计,她认识银行的所有工作人员,包括行长、经理、理财经理与业务员、清洁工与警卫。她是广东人,她有着广东女儿的厚嘴唇与大眼睛。然后她搂住了你,暗示你只要背着她过去,她负责你的款项。然后一切实现了。即使是叫着爷爷,一个妙龄女孩趴到你的背上,人仍然有些兴奋和欢畅。

青春和耄耋本来并不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。青春太多了,压缩成了耄耋。耄耋切成薄片,又回复了青春。

对不起。你还从广东想到了越洋到非洲、欧洲、北美与拉丁美洲。你想到了巴西的狂欢节,除了巴西与月球,你的感觉是哪儿都去过了。然后你思考了良久,这究竟意味着什么。这是不是年轻时候你最担忧的所谓“战斗意志衰退”。这里缺失了一些理想主义,缺少了一些浪漫情怀,失去了文学诗学英雄气概。文学地活一辈子,这并不容易,这容易造成神经方面的夸张与生活方面的偏颇。不再文学或者再不文学了,这也很烦闷,很空洞,很失落,因为在咱们这边,人们对文学的期待与依赖已经太多太多。

2.理想从这里放飞

通过阅读和写作,我的眼界更加开阔,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,曾先后两次作为中学生的代表,出席1958年召开的上海市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,以及1961年召开的上海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。这越发增添了我阅读和写作的兴趣。高中二年级开始,我利用自己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接触面广、消息灵通的有利条件,更加积极地向有关报刊投稿,刊用率也有所提高,并被《青年报》发展为通讯员。

1961年夏天,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晚,我彻夜未眠,浮想联翩,天真地编织着记者梦,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在复旦求学的五年间,我在认真上好每一门正课的同时,更加注重课外阅读,每年寒暑假除星期天回家看望父母外,几乎都住在学校,全副身心地扑在课外阅读上。由于品学方面的进步,我很快被推选为新闻系团总支书记,并于1965年6月大学四年级的时候,和另一位同学被首批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员。

综上所述,无论是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的寒窗苦读也好,还是从接受老师日复一日的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也罢,无不以书籍作为媒介。可以说,是书籍,陪伴我从幼稚岁月步向而立之年;是书籍,让我获得知识,明白事理,奋然前行。这一切,都为我后来的新闻人生和事业发展,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在人生的道路上,谁不会对走出校门踏上社会的第一站,对迈出事业发展的第一步,用今天的话来说,对开始放飞理想的地方和单位,留有深刻的记忆,怀有特别的感情。尤其对离开故土,到异城他乡履职的人来说,情况更是如此。江西宜春《赣中报》(现名《宜春日报》)和《江西日报》这两家报社,就是我初涉新闻工作的起点,是我在新闻路上蹒跚学步的“娘家”。虽然一共才有六年多的时间,但我此后从事新闻教育,担负报社领导工作,努力做一个知名报人,无疑打下了初步的基础,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直到今天,这两家报社仍然是我挥之不去,感恩于心,并且经

常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1966年夏天,正当我们复旦新闻系1961级学生行将毕业,踌躇满志准备在新闻岗位上大展宏图的时候,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。毕业分配被整整推迟了一年多。由于我是新闻系学生团总支书记,又是中共预备党员,在运动中当了“铁杆保守派”,结果被掌控大权的“造反派”,“理所当然”地分到了江西宜春地区的一家小报——《赣中报》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,事实上根据内部预先方案,我报到的工作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。然而,在大部分“保守派”同学都被分配到祖国各地,而且多半要改行,而留上海的几位同学只有一人分到报社的情况下,我经过反复思忖,觉得自己尚且能专业对口,而且被分在不太遥远的江西新闻单位,尽管暂时要离别亲友,但从事的是自己钟爱的新闻工作,总算有了些许安慰。当然,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,所去的地方到底怎么样?工作能不能适应?陌生的环境是否过得惯?心中难免五味杂陈,一切都茫然无绪。

作为踏上新闻岗位的起源地,我在宜春《赣中报》正锋芒初试的时候,却好景不长,不多久省委就以学习河南省灵宝县“精兵简政”的经验为由,下令停办了全省七家地市级报纸。这样,我作为报社的三个“幸运儿”之一,被选送进了省委机关报《江西日报》。虽然在《赣中报》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,但我对报社的一草一木,对同事的言行举止,尤其是对带教过我的师长的音容笑貌,至今记忆犹新,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。可不是吗?对我这个来自大城市上海,涉世不深、人地生疏的新兵,报社二把手主动在午夜到火车站接我,并安排与他同住一室,平日嘘寒问暖,无微不至。从报社领导到各位同仁,对我都关爱有加,放手让我外出采访,鼓励我编辑要闻版面,以至报纸休刊的启事都让我动笔,在委以重任中热心扶持,使我得益良多。我还清楚地记得,在报社党支部讨论我预备党员转正的大会上,与会同志争相发言,给了我多方面的嘉勉,全票通过我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。

我的新闻人生

丁法章